

## 西西小说的香港身份建构

[马来西亚]吴桂英\* · [马来西亚]林春美\*\*

### 目 录

- 一、身份认同与建构
- 二、我城意识的确立
- 三、微观的庶民空间
- 四、宏观的历史寓言

在2006年的一项“香港城市作家”的调查中，西西获得香港读者的一致推崇，高居榜首，其次才轮到向来被称道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其读者”的“大侠”金庸。<sup>1)</sup>这样的结果显示，对于香港人来说，真正能够代表香港这个城市的，不是以其气势磅礴的武侠小说与据此改编的电视剧风靡两岸三地的金庸，而是以平淡笔触书写香港城市老百姓小市民故事的女作家西西。换言之，西西小说所建构/表现的香港身份，最为香港人本身所认同。

---

\* 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博士研究生

\*\* 博特拉大学中文专业高级讲师

1) 2006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周报，针对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台北五大城市所作的年度调查“城市文化跨海大调查，谁是城市作家代表”的结果显示，香港读者所选出的香港代表依次是，西西17票，金庸16票，倪匡3票，李碧华3票，亦舒2票以及其他9票。见郑依依，〈城市文化跨海大调查：谁是城市作家代表〉，[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7-01/26/content\\_7725942.htm](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7-01/26/content_7725942.htm)，2007年1月，阅览于2009年7月15日。

## 一、身份认同与建构

何谓“身份”(identity)?在文化人类学上,它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个体的独特性,一是个体与其他人的本质之差异。而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把文化身份认同界定为三种不同的概念: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启蒙主体以核心的、统一的个体观念为基础,具有判断、自觉和行为的能力,是由内部的核心构成。而这个核心出现在每一个主体出生之时,而不是个体整个的生存期间都保持基本的同一。而社会学主体指的是,在自我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中形成,主体仍然具有内部的核心或者本质,也就是“真正的我”,但是在不断地与“外部”文化世界的对话中被塑造和被调节。后现代主体则是不仅没有固定的、本质的或者永恒的核心,而且还存在着矛盾的、和暂时的身份认同,把人们拉向不同的方向。<sup>2)</sup>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身份认同当可解读为一种有内部与外部结合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它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会因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起变化。易言之,外部的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时空观念等的变动将会动摇人们的身份认同。而当整体的、同质的自我被多样的、异质的身份取代,那么抽象的、普遍的同一将会被具体的、特殊的差异取代。<sup>3)</sup>从霍尔的理论上看来,身份是一种人为的思维,而并非是一种自然现象,也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产物,而是个人在后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上不断建构的单位。

霍尔亦指出,身份认同是在话语之内而不是之外建构,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差异的象征和排斥的产物。他同时将文化身份的定位概括为两种方式:一是单向性和寻找共同性;一是异质性和寻找变化转移。单向性是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认同,如同属于一个种族的、性别的或社会阶层的,或共同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一种文化身份。也即是说,这些在同一个

2) 蒋欣欣〈身份/认同(Identity)〉,见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279。

3) 详阅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文化身份之下的人，共同分享同样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道德的规律。这种文化身份的形成，正是基于“同一”（oneness），强调“本质”（the essence）的原则。至于第二类型的“文化身份”，乃是强调“异质”性（difference），着重的不是单一的社群或国族的认同，也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身份规律，而是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在这个理论之下，文化身份可以是复数的（cultural identities），也即是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的文化身份。<sup>4)</sup>从以上所列来看，霍尔的身份建构有三大重点，即是：身份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身份建构是相对性的，是依据所站的位置来作出界定；文化身份是永远处于变动的过程。而根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sup>5)</sup>他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并认为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研究。因此，分析艺术作品应当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从中去发现这些组合体的本质。<sup>6)</sup>

香港的百年殖民经历，为此地带来迥异于中国大陆的历史背景与政治体系。她在英国治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蜕变成国际性的大都市，而其自由港的地理位置，亦造就香港文化的混杂性与多元性。这些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转变，在香港人对其自身文化身份属性的建构上起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即欲探讨香港作家西西如何在中英二大政治与文化势力之夹缝中确立其香港意识，以及如何透过对微观的庶民空间之书写、与宏观的香港历史之寓言，进一步完成其香港身份之建构。

## 二、我城意识的确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已有吕伦的《穷巷》（1952）、舒港城的《太

4) 同上。

5)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见《文化研究读本》，页125。

6) 罗钢、刘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见《文化研究读本》，页8。

阳下山了》(1962)、刘以鬯的《酒徒》(1963)等小说表现了对香港身份的思考,然而还须待70年代西西的代表作《我城》的出现,才尖锐道破了香港没有“国籍”,而只有“城籍”的处境。<sup>7)</sup>《我城》借外人对小说主人翁阿果身份归属问题的询问,让他得出如此的觉悟:“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sup>8)</sup>。这个醒觉,诚如王德威所言,如同“当头棒喝”,成了“香港文学自白的难忘一刻”。<sup>9)</sup>

《我城》成书的70年代,正是香港社会积极建构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的转捩期<sup>10)</sup>。这个时期亦恰是香港社会与经济秩序转型的年代,加上当时香港大众传媒不断地塑造“香港”的文化想象,并且推行了许多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香港社会文化重心开始转移<sup>11)</sup>。当时的青年(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一代)开始发现香港与他们有着共同依存的关系,他们开始彰显对于这座城市的关怀,亦开始把视线从激烈的“反殖民地意识或抽象的中国情怀上拉开”<sup>12)</sup>。此外,70年代香港境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sup>13)</sup>亦唤起了香港市民同舟共济的精神,形成一个独特的香港意识,让他们产生了如霍尔所说的“同一”之感。明乎此,即

7) 西西的《我城》最初是在香港《快报》连载,后来成书则有4个版本:“1979年的素叶版,1989年的允晨版,1996年素叶增订版,1999年洪范版”,见何福仁〈谈谈《我城》的几个版本〉,见西西《我城》(台北:洪范,1999),页261。本文采用的是1996年素叶增订版。

8) 同上,页14。

9)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1998),页287。

10) 关于香港此时的社会转变,详阅吕大乐《唔该,埋单》增订本(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

11) 例如1970年1月《中国学生周报》推出了:“香港华裔青年何去何从?个人?香港?中国?世界?”,并且不断的刊登有关社会福利、空气污染、居民政策、青年问题等关注现实民瘼的报道与讨论。详阅卢玮銮《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页65。

12) 洛枫〈香港现代诗的殖民地主义与本土意识〉,见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学研究中心,2002)。

13) 1971年8月台风袭击香港,造成人命伤亡;1973年4月股市狂泻,恒生指数从最高峰的1774.96直线下降到400.1;同年11月香港境内石油涨价造成物价涨幅27%;1976年8月山泥倾泻,造成了许多小市民伤亡。详阅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可理解为什么西西小说中的香港人在“没有国籍”的尴尬处境中，却反而高喊“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sup>14)</sup>。反复宣示对“这城市”的认同，其实正是他们对其城籍身份高度认同的宣言。《我城》书中的主角将这个城市称为“我的城市”，一如作者西西将其书命名“我城”，一方面表现了对香港其地的一种亲昵，另一方面亦宣告了“我城意识”的确立。

西西对“我城”不仅只有感性的认同，她亦对香港及香港人的定位做出了理性的思考。〈南蛮〉一文如此书写主角胡不夷的归属：

胡不夷的家是在排头村，排头村是在沙田，沙田是在新界，新界是在九龙，九龙是在香港，香港是在——“英国。”“中国。”“英国。”“中国。”“不是中国。”“不是英国。”“不是中国。”“不是英国。”香港是在地图上，北纬二十二点一一度，东经一百一十四点一四度，占地约四百多平方里。<sup>15)</sup>

香港自秦朝之时纳入中国版图，然而1842年却在《南京条约》下割让予英国。<sup>16)</sup>在上述引文中，叙述者在考量香港的地理/政治的主权归属问题时，两度徘徊在英国与中国之间，可是亦两度否定纯粹的英国属性或中国属性。在既英既中、非英非中的两难之间，她最后干脆在地图上指认香港的位置，明确指出地球经纬某特定之处，那个占地不大的地理空间，不叫英国，不叫中国，而叫香港。

在中、英两股大势力的夹缝之中，西西显然选择了一个既不中又不英的位置。然而，当胡不夷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时，她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澄清：“我是中国人”，且认为“不管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匈奴人、鲜卑人、突厥

14) 西西《我城》，页151-152。

15) 西西《母鱼》（台北：洪范，1990），页63-64。

16) 香港位于中国南海之北岸，珠江三角洲之东岸。香港全岛共分三部分：一是香港岛，二是九龙半岛及昂船洲，三则是新界（包括大屿山及235个离岛）。嬴秦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两汉及三国时改隶博罗县；两晋及宋、齐、梁、陈四朝属东莞郡宝安县；隋唐时改属南海郡县；唐、宋、元、明四朝隶广州府东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英双方爆发鸦片战争，清朝廷战败，翌年，被迫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详阅元邦建《香港史略》。

人、南满人、傣人、苗人，总之是中国人就是了”。<sup>17)</sup>这与《我城》的阿果选择“做黄帝的子孙”意义相同。足见在中、英两方必要有所选择之时，西西更倾向于“不英”多一些。此即王赓武在《香港史新编》一书中所说的，“与英国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然而却又是一种“源自中国价值观”的、“独特的香港意识”。<sup>18)</sup>

尽管西西认同香港与中国的历史与民族的血缘关系，她却并不认为香港处于中国“边缘”，而“香港人”是“次等的中国人”。对西西而言，香港人尽管也是中国人，但到底已是与中国人有别的一个“新的族群”。而这种新的族群属性，与香港一地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殖民背景甚为相关。虽然西西不认同英国，甚至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但她却认同某些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她在〈认知的过程〉一文中提到：“殖民政府作恶多年，居然也带来了华人社会少有的开放、自由，以及法治精神。自由，所以我们出入方便，一直有开阔的视野；法治呢，落实到平民的生活细节吧，做生意无须走后门，看医生不用给红包。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不一定就白人中心”。<sup>19)</sup>而在〈代课〉一文中亦再提及：“是这样的地方让市民学得了一种有用的语言，能够阅读更多的资讯，广阔一己的视野，享受繁荣安定的生活，受到法律的保障，拥有人身、言论、旅游等等的自由。”<sup>20)</sup>香港有异于其共产祖国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不意竟造就香港的自由与开放，让它具备巨大的包容性，故而才有可能如西西所言：“受到不同文化的碰撞，擦出璀璨的火花，产生了鲜活蓬勃的面目，原居民与旧居民、新移民及外来者，汇合成一个新的族群，东西交汇，中外合流”<sup>21)</sup>。因此，我们可以从西西许多作品中看到，她所力图建构的，与其说是一种承传纯粹的中国文化的“在香港的中国人”，不如说是一种与中西双方皆同中有异的香港身份。所以，她的小说人物可以喝西洋红酒吃西式蛋糕，但是依然热衷于买中国紫砂茶壶（〈代课〉里的独身女子）；或者

17) 西西《母鱼》，页101。

18) 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7）。

19) 西西〈认知的过程〉，见杨泽主编《从40年代到90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4），页140。

20) 西西《故事里的故事》（台北：洪范，1998），页86。

21) 同上，页87。

也可以阅读拉丁美洲的《百年孤寂》，同时欣赏中国古典的《史记》（《我城》里的悠悠）。而她的香港街道上则可以出现奏着“一种听来并不觉得怎么凄怆的西乐”的西式丧乐队，与穿着“绣上八卦的红袍”的道士，吹奏中式乐音的乐师，及抬着烧猪的游行队伍（《我城》里的出殡队伍与节日庆典游行）。

实际上，标志着香港意识确立的《我城》从一场具中国色彩、甚至刻意用括弧标示中国传统戏曲术语的葬礼拉开故事的序幕，就可显示出西西的另一番用意。以葬礼开启“我城”香港的故事，就隐隐约约有着诀别的意味——诀别父祖辈，诀别对沉重的祖国/中国“国籍”的执著，而正视与接受香港的“城籍”身份，站在香港年轻的历史上寄望将来。<sup>22)</sup>因此，《我城》才会透过年轻人的视角，着力描绘年轻人注意的事物，揭示城市新生代所展现的视野与生活方式。小说的主人翁的愿望是“将来长大了要创造新世界”<sup>23)</sup>，最后，还以“天佑我城”<sup>24)</sup>来给予城市祝福。小说到处洋溢着这样的乐观、轻松的基调，显示了作者对这城市的自信和认同的态度。这个城籍成了往后西西小说的主体，在“我城”底下，香港人的个体自我 (individual self) 得以舒展，他们在“无国”里找到了“有城”的归属。而西西小说惯常以平淡的笔调书写年轻人的城市生活经验，在平淡中制造一种自得其乐的城市人的性情，不啻可视为是一种书写策略：她之放大书写城籍，其实不无摆脱民族自我 (national self) 长久以来罩下的巨大身影之企图。

### 三、微观的庶民空间

除了确立“我城意识”之外，西西亦通过微观的庶民空间书写——从视觉上

22) 何福仁认为《我城》从“出殡”写起是具有某种“反叛过去的旧、迎接面临的新”的意义（详〈“我城”的一种读法〉，见西西《我城》，页232）；而潘国灵则将其解读为一种“死亡与传承”的关系（详〈“我城”与70年代的香港社会〉，见《素叶文学》第65期，页76）。

23) 西西《我城》，页41。

24) 同上，页160

的街道与建筑、感觉上的港式生活与人情，到听觉上的混杂语言——去进行她对香港以及香港人的身份之建构。

西西对香港的情感，流泻在一条条街道描写之上。她的作品总是凝神观察街上的各种古老店屋。《我城》里透过悠悠细细观察尽把货物挂在门外的传统的杂货店；《哀悼乳房》通过养病的女主角展现兼卖中西药物的摩登中药铺；《候鸟》从素素的眼光透露满各种行业小摊档的街景。而其中〈店铺〉一文更传神地捕捉了香港店铺的混杂精髓：

我们看见许多店，没有一间相同，它们共同生存在一条街上，成为一种秩序。许多类型相同的店总是喜欢群居在一起，仿佛它们本来就是同乡；但是有些店有不同的邻居，它们显然已经结识了不少籍贯相异的朋友……那么多的店：凉茶铺、杂货店、理发店、茶楼、旧书摊、棺材店、弹棉花的绣庄、切面条的小食馆、豆浆铺子，每一间店都是一个故事。这些店，只要细心去看，可以消磨许多个愉快的下午。<sup>25)</sup>

透过对这些街道上“没有一间相同”的店铺的书写，西西展现了香港都市曾经存在过的现实，与市民的传统生活痕迹，以文字保存了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这份记忆与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就像《飞毡》里的莲心茶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的，只知道自有肥水街起，就有了莲心茶。茶铺不论是店面的陈设，经营的方式抑或是味道，都保留了岁月的滋味。经营莲心茶的陈家两老认为：“莲心茶是祖传的茶，莲心就是连心。喝的时候不觉得，过了许久，都会想起来，因为想起茶，就会想起肥土街、肥土镇。喝茶的人和茶之间会产生心连心的记忆，这是需要很多日子慢慢培养的，所以，莲心茶一定得苦”。<sup>26)</sup>西西笔下的店铺，捕捉的正是这份香港人长期积累的“心连心的记忆”。因为对这份记忆的珍惜，因此西西对都市中新事物对旧有秩序所造成的冲击就不免备觉感慨，一如她在〈店铺〉中提到的：“当大街上林立着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我们会从巨大玻璃的反映中看见一些古老而有趣、充满民族色彩的店铺在逐渐消隐”。<sup>27)</sup>

25) 西西《花木栏》(台北：洪范，1990)，页47-49。

26) 西西《飞毡》(台北：洪范，1996)，页91。



然而在不中不英、既中既英环境中成长的作家，西西对现代文明不尽然只是排斥。在《哀悼乳房》中，西西就悠哉地借助文字带领读者游览城市的先进街道与中西文化交汇的建筑。从拱廊街朝四方八面伸展连接大厦的长廊、架空的栈道、现代建筑汇丰银行、古罗马石柱与大理石所建成的奔达大厦、古典的立法局大楼等的描述中，凸显了她的内在经验和文化立场。从她对拱廊街及街上建筑的细致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对都市发展的激赏，以及她对这个城市环境的认识。其中，作为街道上标志性建筑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不仅体现东西方的建筑艺术与美学思想——前者是由英国的著名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所设计，后者则是贝聿铭(I. M. Pei)以充满中国意蕴的竹所转化而成；而且更是中英双方在港政经势力，以及他们双方与香港的密切关系的象征。<sup>28)</sup>西西借着对街道的种种描写，展现了一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并存的香港城市风景。

除了表达对街道、对各种店铺的欣赏与怀念之外，西西也利用笔下的街道来呈现香港城市不同年代的发展。长篇小说《飞毡》中，她写肥土区稀疏的住户原本只是在靠田的地方搭建简陋的砖屋平房，至“农田的一边走出一条小路，后来房子竟沿着小路的两旁逐一兴建起来。”<sup>29)</sup>再到后来，此地的“商人不断把跳鱼弯区的石头运到肥土区去建造银行和高楼大厦，就走出了路来。”<sup>30)</sup>借肥土镇街道的发展，西西寓言了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转变成为国际化的现代城市的过程。

作为一个敏锐的都市观察者，西西发现香港的街道与其他地区的大为不同。其他国家的都市大都是由经过规划而成的，但是香港城市因其暂时“租借”给英国的尴尬身份，英国政府对此地的发展并无长远的规划。大多数的香港街

27) 西西《花木栏》，页49。

28) 也斯在〈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学——历史、范围与论题〉一文中指出，香港建筑上的特色可以与香港文化特色并置思考，尤其在香港政治和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的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它们已不仅是建筑物，而是展现了中英双方相互影响（制约）的一种文化特色。详阅《作家》第14期，页95-111。

29) 西西《飞毡》，页122。

30) 同上，页123。

道，都是依据当时社会所需而无形建成的。所以，比较起其他国家城市的街道图样是“井字形、十字形、亚字形、非字形，还有一颗星的放射形状”，香港市内的街道只能是“一尾尾弯弯曲曲的蛇”<sup>31)</sup>。香港是经由许多代人的努力才有今日繁荣的局面。虽然街道没有经过规划，然而自成一格的道路，却正体现了香港市民的刻苦与辛劳。他们利用“许多的十年”来建立这里的繁华，他们的辛劳皆展现在这些沿海“自生自长”的蜿蜒街道上。对于这些先人的努力，西西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肥水镇还被设计成是一个几乎碰不到十字路口的地方，引人惊叹：

对着肥水区街道图的建筑家，立刻惊叹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广场，没有中心的地方。……没有中心，没有广场，自有它的优势，因为到处都成为中心。正如地球是圆的，哪一点不是中心呢。肥土区的每一条小巷都是中心。<sup>32)</sup>

西西不厌其烦地细细书写肥土镇的每一条街，对肥土镇街道的描写告知了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没有中心所以到处都成为中心，一改人们向来把香港视为中国之边缘的看法。

西西小说所书写的古老的街道、小巷抑或商店皆是她的“乡愁”，小说中罗列的现代街道，现代建筑又是她的“新乡”。西西通过阅读一条街揭示了对曾经存在又即将逝去的城市景象的一种依恋，并且通过文字保留了历史足迹，记录了香港市民曾经有过的生活痕迹以及香港城市发展的痕迹。

除了街景与建筑，西西亦透过小说捕捉香港市民的生活。最初在《快报》上连载的《我城》，正是一部70年代的香港纪实。<sup>33)</sup>这部西西希望能引发读者去思考香港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小说，是通过小市民阿果、阿发、阿北、麦快乐、秀秀、悠悠的生活片断去书写的。<sup>34)</sup>作者在书中关注的，不是

31) 同上，页124。

32) 同上，页124-125。

33) 西西曾经指出，《我城》“每天在报章上发表，一路写，尽管依照大纲，实则也是一路发展，一路思考，随时添加材料。”见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对话集》（台北：洪范，1995），页202。

我城之大事，而是市民生活的小事。比如，她以“苹果牌的即冲小说”之畅销，揶揄当时通俗文化的泛滥；以阿发被许多课业压弯以致变形为“阿发斜塔”的书架，写出中学生面对的升学压力；更以童心幻化的方式缔造了一次政府“带头亲自策划发动”与市民共同协力“抬街”，以克服水库干涸问题的感人情景。这显示了西西对自己城市保持的包容心态，诚如她自己所言是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去想”，然后，“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心态<sup>35)</sup>

而《美丽大厦》则以一栋老旧的电梯公寓为背景，浓缩了大部分的香港都市高楼大厦居民的生活经验。小说不断描写市民的共同活动，如大厦的防盗演习，清洁运动，开大厦互助会等，并通过大厦里晾衣、拜神、买菜、打牌等琐事，勾勒港式生活的风貌，写出香港中下层市民的各种生活形态与集体记忆。西西有意以这座原本叫“梅丽”的大厦作为香港都市的缩影，所以故事开始时，电梯中的局促、挤迫、不着边际、困困、忧虑、惶恐的气氛，不仅折射出香港市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状态，而且，亦如叙述者而言，“反映了都市的全面病态”<sup>36)</sup>。然而，这种情况却在一次的电梯故障中出现了逆转。电梯失灵之后，居住在大厦里的人努力寻求种种方法以解决生活的难题。不仅“妇人们均伸出援协的手，替邻居购买菜蔬或日用品，她们分摊白菜的棵只，鱼头或鱼尾，厕纸的卷数，连同罐头和皂粉”；而且“每一次有人下楼，总在廊道上扬声，愿意带回轻便的物事或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sup>37)</sup>即连在走廊上相逢点头的人，也变得如同同事或同窗那般熟悉。大厦里现代城市人际关系的疏离，在电梯的失灵后产生了莫大的改变。“美丽”，在现代机械出现故障之际，诡异的“做巢”在大厦之上。<sup>38)</sup>其后，大厦里的居民又共同面对了风灾与许多次的意外。天灾人祸一次

34) 西西写《我城》的意图，详同上，页203。

35) 同上，页202。

36) 西西《美丽大厦》（台北：洪范，1990），页94。

37) 同上，页163-164。

38) “做巢”一辞，得自西西的诗歌〈美丽大厦〉：你写信来/仍把我的地址写错了/我住的地方/叫美利大厦/你写的却是/美丽/但我是欢喜的/所以不更正/而且/你是诗人/美丽/是你的祝福/美丽的大厦/啊啊/让我从此就浪漫起来吧/在西晒的窗下/挤迫的空间/从容的生活/常常微笑/并且幻想/美丽/正在我家的梁上做巢。见西西《西西诗集（1959-1999）》（台

次促进大厦居民的交流，激发他们共度患难的精神，让他们以人情之美抗衡现代城市的冷漠与自然灾害的无情，并在“挤迫的空间/从容的生活/常常微笑”（西西诗句）。西西将其小说命名“美丽大厦”，未尝不是她对港式生活的认同与期许。

西西在书写港式平民生活的著作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普罗大众，亦大量在普通话中穿插上海话与广东话等，十分传神地捕捉了香港境内各种方言混杂的情形，呈现了港式平民语言风采。香港人的语言出于中古粤语，文化属于岭南文化，所以一般市民的口头语大部分是使用广东话（粤语）。但是因为香港人也有不少从中国其他地区移民而来，所以他们的口头语也参杂了其他方言。

《美丽大厦》后记里就这样写道：“这大厦住了各种各样的平民，说着各种不尽相同的语言：主要是广东话、上海话、国语。大家可都和平、踏实地活下来了，虽然老是学不好对方的话语，却无碍沟通。过去的香港人总把‘外省人’一概看成是上海人，近年跟台湾、大陆来往得多了，才弄清楚他们的分别。认识别人同时也就更清楚了自己。”<sup>39)</sup>由此可见，语言上的异质性并无碍于香港人本质性身份的建构。西西在解析自己创作的一篇散文里曾经提过，“语言是生活的具体呈现”<sup>40)</sup>。因此她不止在小说中写出各种方言混杂的情形，也写出中英粤的混杂情况<sup>41)</sup>。《飞毡》就有趣的写出了“肥土文”（粤语），“龙文”（中文）和“番文”（英文）多元并存的特殊语言现象。西西敏锐地捕捉了这种现象：正是语言混杂的情况，形成了香港市民语言使用的特点。而香港人，即在如此语言混杂的空间氛围里共同生活。

西西利用小说记录了她的城市语言与文字，留住了她的城市的神情，与一个时代的声音。西西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香港粤语人”<sup>42)</sup>，特意在小说中使用

北：洪范，2000），页51-52。

39) 西西《美丽大厦》，页212。

40) 西西《认知的过程》，页139。

41) 英国政府占领香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推行贸易，因此，英国政府虽然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却并无意消灭中国文化，或全面地对香港市民采取同化政策。英国政府任由香港市民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来继续进行各自的日常生活方式。

42) 西西在上海出生，原籍广东中山；在上海的时候，她和亲戚之间可以一直保持使用粤

粤言，据她自己所言，“不是想夸大语言之间的差异”，亦不是要提倡“本土主义”，只是觉得语言有所歧出，是“一体”之下的“多元”，这对西西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她曾经表示：“当我们阅读上海小说家写‘听头’（罐头）；花莲小说家写‘查某囡仔’（女孩子），并没有觉得他们写错，也不认为那是不好的语言。”<sup>43)</sup>因此，她的小说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不仅可让其中人物保存“香港人”的特色，同时亦让小说具有与生活“零距离”的真实感。因此，在小说里有意识地夹杂使用中文、音译成中文的英文，与方言（粤言/上海话），无疑也是她对其港式生活与语言的高度认同的体现。

#### 四、宏观的历史寓言

西西最能清楚体现香港意识的小说，除了以上所谈的《我城》与《美丽大厦》之外，要数从上个世纪80年代横跨至90年代创作的“肥土镇系列”了。<sup>44)</sup>肥土镇系列由1982年的〈肥土镇的故事〉开始，一直写到1996年的《飞毡》，堪称是西西对香港身份建构之坚持的最佳印记。70年代《我城》与《美丽大厦》的建城意识，在肥土镇系列里得到了延续。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的建议遭当时中国否定后，香港的归属问题就浮上了台面。<sup>45)</sup>香港岛上的居民在面对前途抉择

语，不过踏出家门，用的都是沪语；上课则需讲中文。她曾说在香港住了数十年后，最终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粤语人”。详见西西〈认知的过程〉页139。

43) 同上，页141。

44) 肥土镇系列包括：〈肥土镇的故事〉（1982年10月）、〈苹果〉（1982年12月）、〈镇咒〉（1984年10月）、〈浮城志异〉（1986年4月）、〈肥土镇灰阑镇〉（1986年12月）、〈宇宙奇趣补遗〉（1988年1月）及《飞毡》（1996）。

45) 1979年3月，当时的港督麦理浩（Baron Maclehoose of Beoch）经广州到北京访问中国，而正式对香港前途谈判拉开序幕。从1983年7月开始，经过22轮的会谈，期间更因为英国坚持“以主权换治权”，一度使会谈陷入僵局，后来中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详阅刘润和、高添强《归程熹愿——香港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2007），页263。

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本土文化的问题。这时期香港内部政治的波澜汹涌，造成了这岛上的香港意识空前膨胀<sup>46)</sup>。到了1984年中英双方正式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将于1997年正式回归中国，香港境内许多市民因对中共统治没有信心，以致爆发一次史无前例的移民现象，并且也引发“失城”焦虑。而西西的肥土镇系列正是写于这一关键时刻，这也意味着，西西小说开始从对香港“城籍”身份的肯定与认同期，转入了对“我城”前景与命运的思考期。肥土镇系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透露了西西失城的焦虑，使其香港意识增添几许的“历史苍凉”<sup>47)</sup>。

在《肥土镇灰阑记》里，西西这样写道：“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旧的尚未过渡，新的仍未到来，这仍是一个灰昧昧的年代”<sup>48)</sup>。对于西西/香港人来说，1980年代的香港社会，就是一个“灰昧昧”、前路未卜的年代。他们的“我城”，在此历史转折时刻，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无法牢牢掌控的“浮城”。《浮城志异》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小说以十三幅比利时画家雷内·玛格列特(Rene Magritte)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巧妙地串连成一幅虚构中带有真实香港意象的奇异图文寓言。西西选择比利时的画作来诠释香港实况有着相当的意义，因为两处皆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且也都是同时处于两种强势文化之间：比利时处于荷兰和法国之间，香港则处于中国与英国之间。<sup>49)</sup>西西利用浮城的起源、演变，到它无法预知的未来，进行了一次身份认同的反思。小说一路透过奇幻描述、观察浮城的诸般异状，反映出香港无根的现实，以及香港市民对于无根身份的焦虑心态。

肥土镇系列对这充满焦虑的历史时段与失城无根复杂心态有不同的反映：《浮城志异》中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盼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智慧儿童会使一切都迎刃而解；《苹果》中的人们则选择移民，到外面的世界寻

46) 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

47) 蔡益怀《想象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说(1945-20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页258

48) 西西《手卷》(台北：洪范，1988)页78。

49) 也斯在《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1995)一书中指出，比利时与香港同样处在两种强势文化之间，所以它们的文化特色可以相互参照。

找童话中的奇异苹果，以逃避面对现实中的可怕命运。事实上，西西对香港之回归亦不无既喜又忧的矛盾，在〈镇咒〉中，最后显现在地图上的肥土镇景像是“飞鸟在山巅，莲花在水道，羽毛沿着铁路飘洒，月亮自海面升起”<sup>50)</sup>，然而夹在地图里的符咒是否真的就能守护此地的安定繁荣，亦是作者的疑虑。而她在〈肥土镇灰阑记〉中借两妇争子的民间故事寓意，香港人在关乎他们本身命运的事件上，其实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

西西在香港回归前夕出版的长篇小说《飞毡》，是她的肥土镇系列的总结，亦是整个系列当中最具企图心与深刻意义的一部。小说故事从香港开埠初期一直写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社会的转型期，以至80至90年代的繁荣期，如同一座二十世纪城市的寓言，提供给我们“发现香港、认知香港的一个新方式”<sup>51)</sup>，亦可视为西西在回归前对自身香港文化身份追认的笔记。在她笔下所呈现的香港现实内容，不论是社会历史（香港的经济的发展），还是个人的历史（香港市民的经验），都隐隐约约透露她对这块土地的浓厚感情，故王德威说这是西西“写香港的数部长篇中最见深情的一本”<sup>52)</sup>。她以细腻的笔触呈现她自己对城市历史的解读，利用巨龙国（中国）南方的肥土镇（香港）为背景，述说那里近百年的人事沧桑，交待了市民对城市发展所贡献的努力，并隐喻香港人对这个地域人文认同的事实，同时亦成功地把其香港身份置放于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上去建构。

小说中在肥土镇卖荷兰水的花家和卖中国传统家具的叶家，在经历了各种时局的变幻后，最终因“自障叶”的关系而逐渐消失得“只剩下空白的书页”<sup>53)</sup>，只留下的一个叙述者“我”，对着听者花阿眉，诉说肥土镇的传说故事。这似乎又透露了：或许香港可能即将在回归之后，随着（中国）“国籍”之获得，而失去其独特的“城籍”身份，从此“香港”只能以传说的方式，存留于“香港人”的记忆

50) 西西《胡子有脸》（台北：洪范，1986），页148。

51) 施淑〈文字城市——阅读西西〉，见杨泽主编《从40年代到90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页143。

52) 王德威〈编织物飞行志怪——评西西“飞毡”〉，见《众声喧哗——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2003），页301。

53) 西西《飞毡》，页513。

之中。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对各种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形象与社会意义的书写。其中包括不知打从什么时候便在肥土镇生活的花顺水夫妇、经营莲心茶铺的陈氏两老、外来者花里耶与花里巴巴父子、法国领事罗先生夫妇、商人克罗斯，和成立了日耳曼国文化学会的博贺兹等等。此外，小说也描写了从巨龙国逃难来的李健夫妇，及从肥土镇跑到外国去的花一、花二、花初三、胡嘉等等。小说写出了这些原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族裔与文化背景的肥土镇居民，因久居于此，而对此地衍生出的“地缘上共有共存的认同和记忆”，肥土镇最终变成他们“凝聚身份认同的地方”<sup>54)</sup>。

有学者指出，《飞毡》虽然使用“历史摘录”的方式书写，但却不可将之当作真实的香港历史书，因为这毕竟一本小说<sup>55)</sup>。然而亦有学者非议《飞毡》缺乏对宏大主题，如家仇国恨、天灾人祸等的书写，或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敏感的历史时段<sup>56)</sup>。检视其书，我们可以发现《飞毡》对香港许多政治大事件如67暴动、97问题等，的确特意悬空。然而，作者在书中却对市区制水、火灾实景、山泥倾泻等等许多香港市民共同经历过的事迹有深刻的记叙。小说力图表达的正是朴实的民生，着重写出的亦是这岛上居民乐天知命、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对城市发展所贡献的种种事迹。这突显了西西对香港的历史的解读态度，表现出她对“香港人”自身身份的肯定——“肥土镇就是靠无数这些不折不扣的人们打下的繁荣的基础”<sup>57)</sup>。故我们可以说，这是“西西的香港故事”。被王安忆誉为“香港的说梦人”、被王德威称作“香港经验30年来最重要的记录人之一”的西西，显然并不打算将她的肥土镇/香港寓言，写成历史大事件的记事簿，而更倾向于将之写成香港小市民的梦与经验，香港小市民的生活（小）历史。

不少香港的作家与学者都认为，香港的故事是难说的，许多尝试说的人说来说去，最后却说成了其他地方的故事、其他人的故事。<sup>58)</sup>而西西的香港故

54) 洛枫〈历史想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见《素叶文学》第68期，页155。

55) 陈洁仪《阅读肥土镇——论西西小说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页135。

56) 黄子平〈“百科”香港、“童话”香港——读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星岛日报·书局街》，22/7/1996。

57) 西西《飞毡》，页257。



事，据前述2006年的调查显示，应该较其他作家更为香港人所接受。西西没有特意放大历史背景以渲染悲情，亦没有刻意展示殖民色彩以制造异国情调，而是从小市民的角度出发，去建构属于这个城市的景观，铺展香港市民的生活风貌。她的小说充满一种“天佑我城”的深情，积极为其城建立一种“不是边缘”，也“没有中心”的庄严与包容心态。西西正是透过她的小说创作对香港意识和文化身份做出了建构与追寻。而就西西多年来的创作数量与质量看来，她已经建立了可观的小说疆界，成功地为其香港身份立言。

---

58) 详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见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学研究中心，2002；与黄子平〈没有故事的故事〉，见《BOOK TOWN》第6期。

## 参考文献

- 蔡益怀《想象香港的方法——香港小说(1945-2000)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陈洁仪《阅读肥土镇——论西西小说叙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 蒋欣欣〈身份/认同(Identity)〉, 见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页277-292。
- 何福仁〈《我城》的一种读法〉, 见西西《我城》(香港:素叶出版社, 1996), 页219-259。
- 何福仁〈谈谈《我城》的几个版本〉, 见西西《我城》(台北:洪范, 1999), 页261-265。
- 黄子平〈“百科”香港、“童话”香港——读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 见《星岛日报·书局街》, 1996年7月22日。
- 黄子平〈没有故事的故事〉, 见《BOOK TOWN》第6期(2007年4月), 页23-26。
- 刘润和、高添强《归程熹愿——香港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 2007)。
- 龙海良〈没有根的城市〉, 见《读书人》第5期(1995年7月), 页32-33。
- 卢玮銮《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 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洛枫〈历史想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 见《素叶文学》第68期(2000年12月), 页152-161。
- 洛枫〈香港现代诗的殖民地主义与本土意识〉, 见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学研究中心, 2002), 页226-240。
- 吕大乐《唔该, 埋单》增订本(香港:牛津出版社, 2007)。
- 潘国灵〈《我城》与70年代的香港社会〉, 见《素叶文学》第65期(1999年8月), 页74-79。
- 施淑〈文字城市——阅读西西〉, 见杨泽编《从40年代到90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 1994), 页143-148。

-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台北：麦田，1998），页279-303。
- 王德威〈编织物飞行志怪——评西西“飞毡”〉，见《众生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台北：麦田，2003）。
- 西西《胡子有脸》（台北：洪范，1986）。
- 西西《手卷》（台北：洪范，1988）。
- 西西《美丽大厦》（台北：洪范，1990）。
- 西西《母鱼》（台北：洪范，1990）。
- 西西《花木栏》（台北：洪范，1990）。
- 西西《哀悼乳房》（台北：洪范，1992）。
- 西西〈认知的过程〉，见杨泽编《从40年代到90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1994），页137-143。
- 西西《我城》增订本（香港：素叶出版社，1996）。
- 西西《飞毡》（台北：洪范，1996）。
- 西西《故事里的故事》（台北：洪范，1998）。
- 西西《西西诗集（1959-1999）》（台北：洪范，2000）。
- 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对话集》（台北：洪范，1995）。
- 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7）。
- 也斯〈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见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学研究中心，2002），页11-29。
- 也斯〈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学：历史、范围与论题〉，见《作家》第14期（2002b年2月），页95-111。
- 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 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
- 郑依依〈城市文化跨海大调查：谁是城市作家代表〉，[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7-01/26/content\\_7725942.htm](http://big5.china.com.cn/economic/txt/2007-01/26/content_7725942.htm)，2007年1月。（阅览于2009年7月15日。）

<Abstract>

##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in Xi Xi's Works of Fiction

Goh KweeEng · Lim ChoonBee

Xi Xi who started her journey as a writer since the 1950s, i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prominent writers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a survey done in 2006, Xi Xi was selected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metropolitan Hong Kong. In other words, she gained the highest recognition from the local reader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in Xi Xi's works of fiction. It also analyses how the writing of the commo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the allegory of histor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er 'Hong Kong identity'.

Key Words : Xi Xi,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ng Kong Identity,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투 고 일 : 2011. 5. 7.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
--